

On the Background, Core Issues and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Rising Phenomenon of Immigration

Huang Qih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logy of immigration sprang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s a branch of applied phenomenology. Its appearance not only relates to the anti-metaphysics tradition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but also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fact of phenomenological studies' getting ever more profound and specific. In this process, the cultural, religious conflicts, the political turmoil, and the large number of refugees swarm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from the Middle East,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all in consequence of the extremely unbalanced globalization since the 1990s, also play an eminent role. The phenomenology of immigration that studies the problem of immigration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is faced with three main problematiqu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new immigrants' sense of identity,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ve residents' sense of ident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social contract a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upon which mutual acceptance is to be built. Each one of these problematiques is composed of many inter-linked specific problems, which constitute three mutually independent problem clusters. Only a small number of these problems have been solved satisfactorily. Most of the problems are still unexplored territory, waiting for the philosophers to investigate and research into. It is a field in which Chinese philosophers and their Western peers are synchronously at a same threshold of entrance, so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open up a school of immigration phenomenology of their own and provide a Chinese scenario for solving the global immigration issue. For phenomenology of immigration, there are three key premises: firstly, immigration phenomenology presupposes cultural heterogeneity and takes the ideological analysis of unique space form and sensual material as the subject of its study, hence the phenomenology of immigration should be categorized as a branch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 rather than purely theoretical; secondly, in the three different degrees of reflections of the phenomenology of immigration, the mentality-reflection activities and their intended objects are all empirical, temporary and partial, not issues to be dealt with once for all, and they take as their ultimate goal the realization of harmony among all the cultural others, a harmony that stops not in theory and consciousness, but should penetrate into the sphere of man's will and emotion, namely the field of practice, and it is in this sense we say phenomenology of immigration is not purely theoretical, but rather a pragmatical philosophy; lastly, phenomenology of immigration stops not with either the field of subjectivity or inter-subjectivity, rather, as a form of ide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phenomenon of multiculturalism, it marches on deep into the field of multiculturalism.

Keywords: phenomenology of immigration; applied phenomenology; pragmatical philosophy; multiculturalism

Author: Huang Qihong earned his MA and PhD at Jilin University respectively in 2002 and 2007. From 2007 to 2013, he served as a faculty member at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nce 2013, he has worked as a full professor a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and Western Marxist Political Institute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 chiefly encompasses Western Marxist doctrines, phenomenology of immi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etaphysic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Time and Praxis: an Introduction to a kind of Existentialist Meta-praxiology*, *A Study on Marx's Critical View of Justice*, *Heidegger's Theory of Art*, *Gadamer's Theory of Art and Derrida's Theory of Art*.

移民現象學興起的背景、核心問題和理論定位

黃其洪



[摘要] 移民現象學是美國、歐洲近年來興起的一門應用現象學分支。它的興起，既與西方哲學進入現代以來的拒斥形而上學傳統有關，也與現象學的不斷具體化和深化有關，還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極度不平衡的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衝突、宗教衝突、政治動盪以及大量中東、西亞、北非難民湧入歐洲和美國有關。移民現象學是以現象學的方式去研究移民問題，主要有三個問題群：有關新移民的自我意識重構問題；有關原住民的自我意識重構問題；有關新的社會契約的形成和認同的意識基礎問題。這其中的每一個問題，都是一個龐大的問題群，都由許多具體問題構成。這些問題環環

相扣，構成三個相對獨立的系列。在這些問題中，祇有一小部分問題已經得到解決，絕大部分問題還是全新的，等待哲學家們去開墾和耕耘。中國的哲學家在這一領域與西方基本上是同步的，完全有可能開創有中國特色的移民現象學學派，為世界性的移民問題提供中國方案。對移民現象學來說，有三組定位是很關鍵的：（1）移民現象學中存在着一種存在設定，即文化異質性設定，它是對特殊形式的空間和感性材料的意識分析，移民現象學因此屬於應用現象學，而不是純粹現象學。（2）在移民現象學三個不同向度的反思中，意識反思活動和意向對象都具有經驗性，都是暫時的、局部的，不是一次性完結的，其最後的目的在於實現文化他者之間的和諧關係；這種和諧關係不能祇停留在理論和意識內部，必須深入到意志和情緒的領域，因而它要達致實踐的領域，所以，移民現象學屬於實踐哲學而不是理論哲學。（3）移民現象學已經不再停留於主體性的領域，也不再停留於一般的主體間的領域，而是深入到文化間性領域，是一種關於文化間性的意識反思。

[關鍵詞] 移民現象學 應用現象學 實踐哲學 文化間性

[作者簡介] 黃其洪，2002—2007年在吉林大學分別獲得哲學學士、哲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2007—2013年任教於華南科技大學哲學系，現為西南大學三峽庫區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西方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西方馬克思主義、移民現象學和形而上學重建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時間與實踐——一種生存論的元實踐學導論》《馬克思批判性正義觀研究》《海德格爾論藝術》《伽達默爾論藝術》《德里達論藝術》等。

移民現象學是近年來在美國和歐洲學術界興起的一門應用現象學分支。自其誕生以後，無論是哲學領域的專家，還是經濟領域的知識分子，抑或是在政治領域的專家型政客，都對其傾注了很大的熱情。甚至有學者認為，這是“哲學對現實的苦難和困境的一種回應的當代典型”^①。本文試對移民現象學興起的理論與現實背景、核心問題以及如何定位這種新興的哲學分支進行討論，以期能引起漢語學術界對該領域的關注和深入研究。

一 移民現象學興起的背景

在巴比耶里（William A. Barbieri）看來，近年來興起的移民現象學，既與西方哲學進入現代以來的拒斥形而上學傳統有關，也與現象學的不斷具體化和深化有關，還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極度不平衡的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衝突、宗教衝突、政治動盪以及大量中東、西亞、北非難民湧入歐洲和美國有關。可以說，移民現象學既是西方哲學特別是現象學運動發展的一個結果，又是世界和西方令人擔憂的社會現實的一種理論表徵。^②

首先，移民現象學的興起是西方現代哲學拒斥形而上學傳統的一種發展。在西方哲學進入現代之前，長期存在着將形而上學看作是第一哲學的傳統，要麼是近代之前的實體形而上學，要麼是近代之後的主體形而上學，儘管它們在理論範式、論證思路和基礎命題上有千差萬別，但都認為存在着某種實體或者原則，可以將所有的概念、範疇、關係貫穿，可以解釋豐富多彩的有限世界和現象世界，可以用“一”統攝“多”，用本質規定現象，用實體統攝屬性，而所有的有限世界、現象世界的意義和價值都可以還原到這個實體或者原則上。^③亞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阿奎那（T. Aquinas，約1225—1274）、黑格爾（G. W. F. Hegel，1770—1831）是這一傳統在不同時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分別展現了形而上學在古代、中世紀和近代發展的極致狀態。與此不同的是，在黑格爾之後，由於種種原因，儘管出現了懷特海（A. N. Whitehead，1861—1947）、蒂利希（P. J. Tillich，1886—1965）等繼續堅持和發展形而上學傳統的哲學家，但現代哲學的絕大多數“新派哲學家”都採取了不同的拒斥形而上學的立場。也就是說，雖然他們各自主張的理由、觀點不同，但在反對形而上學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④馬克思（K. H. Marx，1818—1883）強調回到現實具體的人的感性活動去理解人和人的歷史，反對用一以貫之的原則或者實體來解釋人的世界。^⑤克爾凱廓爾（S. A. Kierkegaard，1813—1855）強調回到“或此或彼”的深度的差異性和選擇性中去理解人的生存體驗和宗教體驗，反對對信仰和價值進行形而上學的論證。^⑥尼采（F. W. Nietzsche，1844—1900）、福柯（M. Foucault，1926—1984）等人強調形而上學的真理觀在本質上是權力意志作祟的結果，並不存在普遍的唯一性真理，也不存在那種可以統攝一切的實體或者原則，形而上學是專制、強權和暴力製造出來的一種工具。由羅素（B. A. W. Russell，1872—1970）、摩爾（G. E. Moore，1873—1958）、維特根斯坦（L. J. J. Wittgenstein，1889—1951）等人開創的分析哲學，更是激進地認為傳統形而上學由於沒有徹底地貫徹經驗的原則，也沒有嚴格遵循形式邏輯，使得它們變成爲一種無意義的廢話，一種最多具有文學意義的東西，傳統形而上學的命題沒有任何的科學價值。卡爾納普（R. Carnap，1891—1970）說得更直接，分析哲學必須“以對科學命題的語義分析來拒斥形而上學”^⑦，“哲學已經終結，大科學的時代已經來臨”^⑧。布倫塔諾（F. C. Brentano，1838—1917）、胡塞爾（E. G. A. Husserl，

① Heinz-Gerhard Justenhoven, William A Barbieri, *From Just War to Modern Peace Ethics*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2012), 13.
 ② William Barbieri, "At the Limits of the Secular: Reflections on Faith and Public Life",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2014), 11.
 ③ [德]海德格爾：“哲學的終結和思的任務”，《面向思的事情》（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陳小文、孫周興譯，第70—72頁。
 ④ [德]伽達默爾：“20世紀的哲學基礎”，《伽達默爾集》（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鄧安慶等譯，第296頁。
 ⑤ 高青海：“哲學的創新”，《高青海哲學文存》（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1卷，第97頁。
 ⑥ [丹]京不特：《黑格爾或基爾克郭爾》（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第23頁。
 ⑦ [美]卡爾納普：《世界的邏輯構造》（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陳啓偉譯，第12頁。
 ⑧ [美]卡爾納普：《科學哲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張華夏、李平譯，第5頁。

1859—1938)開創的現象學運動也認為傳統形而上學應該被終結，因為那是一種“先驗的幻象”或者“超驗的獨斷”；為了尋找到對具體的個體真正有意義的東西，必須拒絕形而上學“大鈔票”，僅使用那些具有內在意識明證性的“小零錢”。^①總之，不管是現代哲學的哪一種拒斥形而上學的路向，都強調哲學必須變革，如果哲學無法再尋找到真理，無法再成為真理的代言人，那麼，與其去苦苦尋求大寫的真理而不得，還不如去關注那些具體的問題，為解決這些具體的問題提供建設性意見。移民現象學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出現的，是哲學自動調整自己的功能和定位的一種當代表現。^②

其次，移民現象學也是現象學運動不斷具體化和深化的結果。現象學運動自胡塞爾《邏輯研究》出版以來，已經有一百一十七年的歷史。在這期間，現象學大致經歷了五個時代的發展，展現出一個不斷具體化和深化的過程，而且也在逐漸應用化，與一些具體的應用學科相結合。（1）從1900年《邏輯研究》的出版到1910年《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的出版，是現象學方法論提出和初創時期。在這一時期，胡塞爾是現象學的主要旗手。他通過艱苦努力，一方面將現象學的方法與傳統思辨哲學的方法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將現象學的方法與心理主義的主觀方法區別開來，展望了現象學作為一門嚴格科學的可能性。^③（2）從《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開始，現象學不斷走向本體化和先驗化，把本體化與先驗化結合起來，力圖為自然科學奠定嚴格的認識論基礎和價值基礎，並在此基礎上，構造出一個具有絕對明證性和普遍性的世界。而且，這個世界既是事實的世界，又是價值的世界，力圖實現事實與價值在先驗自我中的統一。^④雖然現象學的這步發展主要是胡塞爾推動的，但這種努力遭到了他的大多數學生的反對。（3）從1927年海德格爾（M. Heidegger, 1889—1976）的《存在與時間》出版開始，現象學進入到第三個時期^⑤。在這一時期，不同的現象學家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和主題，但是有一點卻是相同的：他們都強調現象學應該徹底放棄那種無限還原的可能性，放棄那種在絕對明證性和先驗自我中重構世界的可能性；認為第二個時期的思路還是一種絕對的理性主義的思路，這實際上是幻想人具有神那樣的眼光。因此，他們明確主張從人的有死性出發，通過時間性、歷史性的維度去揭示人與世界之間的真實的關聯。^⑥儘管這種關聯可能會因為個體的主觀性而無法避免相對主義，也可能因為缺少普遍性、絕對性的標準而迷失方向，但這種有限性的超越卻把生活世界鮮活地展現在人的意識面前。因此，也可以說，第三個時期是生活世界現象學時期。^⑦（4）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着列維納斯（E. Lévinas, 1906—1995）晚期作品的出現，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論交往理性的相關著作的出現，現象學進入到第四個時期，也可以稱作“主體間性現象學時期”。在這一時期，同一文化中的不同主體之間如何在意識中構造對方並形成相互承認的穩定的契約這個問題成為現象學關注的核心話題，“主體間性”“交往理性”“他者意識”等等成為這一時期現象學著作中的高頻詞彙。（5）二十一世紀初，隨着以美國為首的歐美世界在“冷戰”結束後強力推行全球主義的逐步深入，使得西亞、中東、北非地區在政治動亂中出現的大批新移民湧向歐洲和美國，不同文化和宗教間生活方式的衝突、價值觀念的衝突等等越來越成為敏感的話題。在這種背景下，現象學在2012年前後進入了它的第五個時期，即“移民現象學”時期。在這一時期，現象學的基本方法仍然保存下來，但討論的主題卻發生了明顯變化，既不是一個大而全的世界，也不是以個體為中心的生活世界，更不是在同一文化內部的主體間的世界，而是文化間性的世界。^⑧

① [德]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李幼蒸譯，第98頁。

② William Barbieri, "Toward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Germ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6.

③ [德]伽達默爾：“現象學運動”，《哲學解釋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夏鎮平、宋建平譯，第132頁。

④⑤ [美]羅伯特·索科拉夫斯基：《現象學導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高秉江、張建華譯，第112、119頁。

⑥ [德]伽達默爾：“海德格爾和形而上學語言”，《哲學解釋學》，第232頁。

⑦ Cristina Lafont, *Heidegger, Language, and World-Disclos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2.

⑧ Mamuka Dolidze, *Intentionality of Time and Quantum—Phenomenological Sense of Space* (German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 69.

再次，移民現象學是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極度不平衡的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衝突、宗教衝突、政治動盪的理論回應。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着蘇東劇變，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遭遇重大挫折，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竭力鼓吹資本、勞動力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鼓吹自由民主的所謂“普世性”，鼓吹全球統一的金融、工業、貿易和市場體系，弱化民族國家的國家主權，以一種抽象的人權、形式的平等來削弱傳統的主權概念。為了推行這種“全球主義”，不惜動用武力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內政進行干涉，發動戰爭推翻那些“不聽話的政權和統治者”，建立親西方的政權，移植西方式的民主體制。經過二十多年的推行，這種一體化的全球主義一方面造成了歐美發達國家更加嚴重的兩極分化，使那些少數擁有金融霸權和虛擬經濟的獲益者越來越富，中產階級不斷淪為窮人，窮人的人數和比例都在不斷增加；另一方面，那些在這種一體化的全球主義運動中沒有堅守住自己國家的產業政策和政治穩定的國家大多陷入政治動亂、經濟停滯，甚至是社會分裂的狀態之中。也就是說，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和歐美發達國家的中下層都成為這場不公平、不正義的全球化運動的受害者。^①在戰亂或者發展無望的背景下，西亞、北非、中東地區的難民大量湧入歐洲和美國。由於這些地區並沒有完成一個完整的現代化過程，大多在文化上保持着各自的傳統文化，因而他們在宗教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上都與歐美發達地區的人們有很大差別。這些新移民來到歐美發達國家之後就與當地人之間發生了許許多多或劇烈或隱性的衝突。如何去回應這種衝突，就成為當今世界普遍關注的話題。在沒有搞清楚這些新移民重構自我意識和他者意識的情況下，在沒有理清原住民面對文化他者時內在意識的那種緊張、焦慮和自我調適的機制的情況下，在沒有弄清不同文化的他者之間形成新的統一性意識之前，就直接去制定相關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雖然也可能因為偶然性的原因而取得一定的效果，但犯錯誤的可能性會更大。因此，為了更加有效地解決不同文化的他者相互理解、相互溝通和共建新的自我意識的問題，為了在移民地區重建穩定和繁榮，移民現象學的研究和思考似乎是必不可少的。^②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西方世界出現了“移民現象學”這一應用現象學分支。

二 移民現象學的核心問題

“移民現象學”顧名思義，就是以現象學的方法來研究移民問題。移民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群，可以從不同的學科和不同的方法去研究它。移民現象學把自身限定得很明確：（1）從學科的角度看，它屬於哲學研究，而不是實證研究，不屬於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的範疇。因為它不是建立在經驗觀察和形式邏輯推理基礎上的，所得出的結論也不是一些具體經驗的操作性結論，而是一種形式化的具有普遍性的結論，一些關於意義和價值的結論，一些具有先驗化傾向的結論。^③（2）移民現象學也不是一般的哲學研究，而是現象學的研究，因為它帶有現象學方法的特徵。這決定了祇有那些可以採用現象學方法進行研究的對象，纔可能成為移民現象學的研究對象。^④

要弄清楚移民現象學的研究對象，首先需要搞清楚現象學的方法具有怎樣的獨特性。在西方哲學史上，有四種研究方法比較典型：第一種是詩化哲學的方法。它將哲學與詩歌結為一體，在詩歌的表述方式中蘊涵哲學的思考，感性的意向與哲學的概念還沒有完全分離，邏輯思維還沒有成型，不是建立在嚴格的概念界定基礎上的邏輯推導，而是以詩歌的語言獨斷地言說哲學命題。^⑤第二種是概念哲學的方法。嚴格地界定概念，尋找最高的概念，然後按照嚴格的邏輯進行推演，概

① 黃其洪：“弱世界主義是世界和平和繁榮的保障”，《社會科學報》2016-03-31（3）。

② Mamuka Dolidze, *Intentionality of Time and Quantum—Phenomenological Sense of Space*, 73.

③④ D Adizbaeva, A Shoibekova, “Phenomenological Dialogue as Result of Evolution of the Main Strategy of the West European Philosophy in the XX Century”, *Asian Social Science* 16 (2015): 109, 111.

⑤ Mamuka Dolidze,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and Method of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alecta Husserliana* 108 (2011): 553-559.

念、判斷、推論成爲概念哲學的基本形式。它的具體形式有三：（1）對話式的哲學。在一定的戲劇場景中，讓不同的個人圍繞一定的哲學話題進行對話。雖然不是獨白，但是每一個對話的參與者都具有概念思維，都是在概念、判斷和推論的形式中進行討論。（2）形而上學。從最基本的問題和最高的概念出發，遵循形式邏輯或者思辨邏輯，一步步嚴格地往前推演，最後建構起一個概念的體系。（3）懷疑論哲學。以概念、判斷和推論的方式對既有的哲學概念或者哲學原則進行前提性反思，否定其合理性，最後要麼確定某一種知性原則，要麼否定一切真理的可能性。長期以來，人們對懷疑論有一種誤解，認爲懷疑論是反概念的哲學，是對概念哲學的否定。其實，從其工作方式來看，懷疑論仍然是概念哲學，它祇不過是對形而上學的反對而已。^①概念哲學雖然具有普遍性和可傳遞性，但在直觀性和體驗性方面相對較弱。第三種是分析哲學的方法。通過形式邏輯的還原和經驗證實或證僞的方式對哲學命題進行語義分析，以此來澄清哲學概念或者命題的意義，命題的清晰性和可驗證性是分析哲學的目標。但是，從終極的意義上來看，分析哲學祇是一種哲學的準備，而非真正的哲學建構或者批判。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哲學的成果不是一些‘哲學命題’，而是命題的澄清。”^②第四種是現象學的方法。它追求意識的明證性和概念的清晰性，因而與詩化哲學不同；它追尋哲學概念產生的前提，思索前概念和前判斷的領域，力圖明證性地說明哲學概念和判斷的內在意識基礎，活動的基礎和對象的基礎，因而與概念哲學也不同；它採用的是先驗還原和本質直觀的方式，因而與分析哲學的形式邏輯還原和感性直觀更是明顯不同。

正是現象學方法的這些獨特性，決定了它研究對象的獨特性。具體到移民現象學研究來說，它所面對的問題有三個方面：

首先，有關新移民的自我意識重構問題^③。這是一個巨大的問題群，包括新移民在面對陌生世界和陌生文化時，他的自我意識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是一種自我的間距化還是自我的迷失？新移民是否可能走出自身文化意識的暈圈去同情地理解新居住地文化他者的文化？新移民如何走出這個暈圈，生發出新的文化意識？文化他者的他性是如何在移民的意識中被呈現的？文化他者是如何在移民的意識中建構起來的？新的空間定位是如何發生的？新的時間感是如何建構起來的？這些新的空間感和時間感對於新移民的世界意識有怎樣的影響？原有文化的自我定位與新的自我定位之間是什麼關係？文化觀念的衝突在移民意識內部是如何發生的？移民如何在意識中化解這種衝突，形成新的自我意識？克服這種衝突的心理機制和邏輯機制是什麼？等等。

其次，有關原住民的自我意識重構問題^④。這也是一個大的問題群，具體包括：從原住民這一邊來看，如何明證性地建構起一個文化他者的形象？如何理解文化他者的價值觀、人生觀和行爲模式？是同情的理解還是對象化的理解？是否需要保持自身與文化他者之間視域的間距？是否需要對自身的意識保持一種間距和反思的狀態？如何合理地形成與他者的同情和共感？對文化他者形成友愛的意向是否可能？這種友愛的意向形成的動力是什麼？它與對象化的意向行爲之間是什麼關係？如何對一個文化他者形成友愛的意向？與文化他者進行有效的溝通是如何可能的？信仰與宗教的對話何以可能？如何在吸納新的文化元素的同時保持原有文化的自我延續？如何由“我”的意識與文化他者一起上升爲“我們”的意識？等等。

最後，有關新的社會契約的形成和認同的意識基礎問題^⑤。在以往的全球化過程中，總是強調新移民對新的居住地社會契約的被動接受，把這些已有的社會契約當成確定不疑的東西灌輸給新移民，似乎原有的社會契約不需要做任何的調整。這種做法對於同一個文化內部的移民不構

① 黃其洪：“休謨主義的勝利：我們時代的精神氛圍”，《天津社會科學》5（2005）：43—47。

② [英]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賀紹甲譯，第48頁。

③ Mamuka Dolidze,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and Method of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alecta Husserliana* 108 (2011) : 553-559.

④ William Barbieri, “Toward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Germ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9.

⑤ Roberto Esposito, *Da fuori. Una filosofia per l'Europa* (Piccola Biblioteca Einaudi, 2016), 14.

成問題，對於小規模的異質文化的移民的到來也不會構成問題。但是，在今天的不平衡的、動盪的、大規模的全球化背景下，原有的做法可能需要被調整。爲了真正形成移民與原住民之間和諧共生的關係，爲了讓移民真正融入新居住地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成爲新居住地有機的一分子，與原住民之間形成共居、共建、共享的關係，可能需要考慮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如何在社會契約方面體現新移民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的獨特性？如何形成既能夠保持原住民的傳統又適當吸納新移民的文化傳統的新的社會契約^①？這種新契約又是如何產生的？它的意識活動的基礎是什麼？新移民和原住民是否可能對新的社會契約產生認同？這種認同的意識基礎又是什麼？等等。這些問題都可以而且應該以一種現象學的方式來回答。

到目前爲止，這些問題中的絕大多數還沒有被現象學回答，儘管有些問題已經開始研究，但還有待深入，因此，移民現象學是一片大有可爲的廣闊的理論天地，等待人們去開墾、去耕耘。中國的哲學家在這一領域基本上與西方是同步的，完全有可能開創有中國特色的移民現象學學派，爲世界性的移民問題提供中國方案。

三 移民現象學的理論定位

從不同的理論視角觀察，會對移民現象學產生不同的理論定位。爲了更直觀地對這個陌生領域進行理論定位，下面試採用學術界常用的三種視角。

其一，從現象學內部來看，移民現象學屬於應用現象學，而不是純粹現象學。按照胡塞爾的看法，現象學可以分爲純粹現象學和應用現象學。純粹現象學考察的是先驗自我如何被構造，先驗自我的意向活動如何發生，先驗對象如何被構造，內時間意識如何行動等問題。^②應用現象學是與空間和歷史有關的領域，因而感性材料和雜質參與了這種現象學反思活動。這種現象學已經不再純粹，但卻可以與通常所說的現象世界相關聯，是對現象世界的構造機能和意識活動的明證性的反思。通過這種反思，可以發現經驗現象內在包含的普遍性形式，也可以找到其他可能的形式，發現與此經驗現象同類的還沒有出現的可能經驗。因此，純粹現象學的優點在於純粹，但是卻缺少生產性格；應用現象學不純粹，卻具有一定的生產性，它可以發現經驗中沒有出現的別的可能性。^③由於移民現象學不專注於先驗自我的構造、先驗自我活動的形式反思以及先驗對象的普遍形式等內容，因此，它不是胡塞爾意義上的純粹現象學，不是“第一哲學”。同時，移民現象學也不是對一般的空間感性對象的意識分析，因而也不是胡塞爾意義上的“第二哲學”，不屬於黑爾德（Klaus Held）意義上的“世界現象學”。在移民現象學中存在着一種存在設定，即文化異質性設定，因而它是對特殊形式的空間和感性材料的意識分析，研究者可以順着胡塞爾的思路，把移民現象學叫做“第三哲學”。它與政治現象學、經濟現象學、建築現象學、法律現象學等，同屬於一個層次的應用現象學。^④這種現象學已經不是胡塞爾當年所設想的“作爲嚴格科學的哲學”，而是一種具有隱喻性質的價值和政治的哲學^⑤。

其二，從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的區分來看，移民現象學的目的不是爲了達到對先驗自我、先驗意識活動和先驗對象的理論把握，從而祇是對這些活動進行意識明證性的說明；如果是這樣，它祇是一種“理解世界”的哲學，而且將具有絕對的普遍性。它的真正目的在於，能夠尋找到新移民對文化他者和陌生世界的意識構造，尋找到新移民形成新的自我意識的意識機能，尋找到重構新移民的生活世界的機制。通過這種反思性的尋找，使新移民與文化他者、陌生世界之間形成

① Abdussalam A. Guseinov, "Is Absolute Morality Possible in Modern Pluralistic Society?", *Comparative Ethics in a Global Age* (New York: RVP Press, 2007), 33.

② [德]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第98頁。

③ [德]克勞斯·黑爾德：《世界現象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倪梁康等譯，第201頁。

④ William Barbieri, "Toward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German History*, 37.

⑤ [德]伽達默爾：《價值倫理學和實踐哲學》，《伽達默爾集》，第267頁。

一種和諧的關係，這裏面離不開同感、同情、換位思考等意識形式。另一方面，在移民現象學的意識反思中，原住民的內在意識也不是停留在自身之中的，而是不斷地指向自身外部，指向自身外部的文化他者，力圖在自身與文化他者之間形成新的世界共同體。除此之外，移民現象學還討論新的社會契約形成的意識基礎問題以及新移民和原住民對這一新的社會契約認同的意識基礎問題。這些問題也不是簡單的“解釋世界”的問題，而是“改造世界”的實踐領域的問題。在移民現象學三個不同向度的反思中，意識反思的活動和意向對象都具有經驗性，都是暫時的、局部的，不是一次性完結的。其最終目的在於，實現文化他者之間的和諧關係。這種和諧關係不能祇停留在理論和意識內部，必須深入到意志和情緒的領域，因而它要達致實踐的領域。^①它不僅要改造經驗的文化他者的自我，而且要改造一個陌生的充滿衝突的世界，因而它是一種“改造世界”的哲學。在這一點上，移民現象學還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有某種親緣關係。這也許是目前創建和研究移民現象學的學者都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頗有好感的原因。

其三，按其活動領域來劃分，移民現象學已經不再停留於主體性的領域，也不再停留於一般的主體間的領域，而是深入到文化間性領域，是一種關於文化間性的意識反思。^②主體性的領域無法克服唯我論的陷阱，即使宣稱是先驗自我，也難以切中意識之外的對象自身，這就是康德理論哲學和胡塞爾前主體間性哲學的困境。康德（I. Kant, 1724—1804）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說：“即使我們有可能通過純粹知性對於自在之物本身綜合地說出點什麼（雖然這是不可能的），然而這畢竟根本不會有可能與現象發生任何關係，這些現象並不表象自在之物本身。”^③康德力圖通過實踐理性、審美理性、歷史理性來彌補這一缺陷，但由於康德根深蒂固的知性思維方式，最終使得他無法解決這個問題。胡塞爾大約是在1925年之後也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探討主體間性問題，其目的就在於擺脫唯我論的糾纏，避免“物自體”對意識的普遍性和客觀性構成的挑戰。經過近十年的探索，他終於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驗論的現象學》中較為系統的提出了生活世界理論和主體間性理論。海德格爾也在1927年的《存在與時間》中實現了這種轉向，舍勒（M. Scheler, 1874—1928）、梅洛-龐蒂（M. Merleau-Ponty, 1908—1961）則分別在自己的哲學中實現了這種轉折。可以說，1925—1955年這三十年間，是現象學和哲學從主體性哲學向主體間性哲學突破的關鍵時期。到了1980年代之後，一方面是主體間性哲學範式自身的理論效力已經釋放完畢，其理論困境日趨明顯；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性的文化衝突與對話，全球性的移民問題使文化間性所帶來的哲學問題日益凸顯，無論是理論和現實都迫切需要哲學獲得進一步突破。列維納斯、利奧塔（J. F. Lyotard, 1924—1998）、德里達（J. Derrida, 1930—2004）、伽達里（Pierre-Félix Guattari, 1930—1992）、麥克林（George F. Mclean, 1929—2016）等人從那時起開始了對文化間性問題的討論，這是移民現象學出現的直接背景。文化間性與主體性間最大的區別在於：在文化間性中，那個他者是文化他者，而不是同一個文化內的他者，因此，這個他者與自我之間很難形成簡單的先驗的同一性。異質性和多元性的文化他者逼迫自我祇能通過改變自身，以一種間接性的方式與文化他者一道形成某種暫時的經驗的同一性，而不是絕對的先驗的同一性。^④形成這種暫時的經驗的同一性的方式，也不能祇是意識內的本質直觀方式，而必須來到意識之外，在行動中對話與協商，傾聽與諒解。這也是移民現象學必然走向實踐的領域，成爲一種實踐哲學的原因。

當然，除了以上三種視角之外，人們還可以從其他視角對移民現象學進行理論定位，但就目

① 黃其洪：“論實踐哲學研究的五對重要區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2（2015）：81—92。

② William Barbieri, “The Heterological Quest: Michel de Certeau’s Travel Narratives and the ‘Other’ of Comparative Ethics”,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30 (Spring 2002) : 23-48.

③ [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鄧曉芒譯，第246頁。

④ William A. Barbieri,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Bounds of Civil Society”, *Civil Society: Who Belongs?* (Washington: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2004) , 36.

前中國學術界的學科劃分來看，以上三種區分可能是學術界最為看重的。一旦這三種區分方式釐定，“移民現象學”這個陌生的研究領域也就在人們心目中有了大致的理論形象。在這些定位的基礎上推進中國的移民現象學研究，甚至提出中國自己的移民現象學主張，也就有了基礎。

[編者註：該文係作者承擔的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點項目“阿倫·奈斯深層生態學思想研究”(16SKB015)、西南大學中央業務費重點項目“西方空間哲學與城市化理論研究”(SWU1609126)的階段性成果。]

《南國學術》簡介

《南國學術》是由澳門大學出版，以“大人文、跨學科、超界域”為發稿理念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理論期刊，每三個月推出一期。在文章側重上，既探討全球問題、區域問題，也探討中國問題；在以全球視角看東方和中國的同時，還以東方視角關注世界問題。主要欄目有：

1. “與名家面對面”。對話性欄目。從世界、亞洲、中國三個維度對所熟悉的學科或相關學科存在的問題或和解決之道暢所欲言，並對未來的學術發展作出預測或瞻望。提問者與學術名家不是採訪式的記者問答，而是就雙方所感興趣的學術話題進行交流和探討；既可以觀點相同，也可以觀點不同，甚至可以相互展開爭論、批評對方的觀點。目的在於，通過對話這種形式，做成一篇對話體的學術文章。

2. “前沿聚焦”。跨學科性欄目。以精闢的文字、敏銳的視角，對世界、亞洲、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熱點問題或前沿問題發表一得之見，展開深度討論。在形式上，注重以專題性討論和綜合性論文相結合。

3. “時代問題論爭”。跨學科性欄目。針對當代一些重大學術問題，通過學者與學者間的對話、批評者與被批評者間的交鋒，在活躍學術氣氛的同時，使讀者對一些相關問題產生興趣，開闊視野。在形式上，既有專題性討論，也有綜合性論文。

4. “東西文明對話”。跨學科性欄目。以刊發海內外學者對東西方文化、文明中的前沿問題的研究心得或最新成果為紐帶，搭建起中外學術交流、對話的橋樑，實現海內外學術研究成果的合作與共享。在形式上，既有專題性討論，也有綜合性論文。

5. “述往思來”。跨學科性欄目。通過對學術史的回顧與總結，對當今學術發展和思想繁榮起到警示、啓迪、借鑒作用。在形式上，以綜合性論文為主。

6. “中國歷史文化論壇”。綜合性欄目。對燦爛悠長、篤實深厚的中國歷史文化做全方位研究。在內容上，既關注熱點問題，也開闢未知領域；在形式上，既有專題性討論，也有綜合性論文。

7. “思想者沙龍”。綜合性欄目。對世界、亞洲、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基礎理論進行正本清源的梳理和闡釋，以期探索新領域，發掘新資料，建構新體系。在形式上，以綜合性論文為主。

8. “漢語新文學研究”。學科性欄目。對以“五四”新文學為傳統、現代漢語為語言載體，在中國大陸、臺港澳地區和世界各國各地區歷史存在與現實發展的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學運作及其他文學現象進行研究。在形式上，既有專題性討論，也有綜合性論文。

9. “獨家評論”。書評性欄目。文章是在學理層面、學術史意義上，對所評論的著作作出合理的定位，指出它的進步與不足；不“捧”不“罵”，言之有物，為讀者更深刻的理解某一著作提供幫助。

10. “域外傳真”。綜述性欄目。通過“述”與“評”相結合的形式，定期向中國學術界傳遞域外的最新學術動向、學術思潮、學術流派，促使中國學者與海外學者在學術研究上保持同步。